

亚洲教堂建筑处境化的启示

Contextualizing the Architecture of Church Buildings
in Asia—Reflections and Insights

宇汝松 南京大学

Yu rusong Nanjing University

[英文提要]

Architecture art is the focus embodiment of the time spirit and it gives the most intuitional vision art effect to the artificial nature. The church architecture must also embody the time spirit and the local colour, besides the necessary theological thought.

The church architecture never has a fixed pattern all through the ages, and it is always being in the course of changing and developing. Not only can this be proved by the keeping changing church architecture styles in the European church building history, but also it can be understood by a frondose convective evidence from Asian church architecture, that is, since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many Asian countries have been constructing their churches one after another which are full of their own nationality characteristics and age breath, as well as the theology essence of Christianity. That the indigenization churches bring new life to Asian Christianity has already been approbated by the world.

But to our abashment,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which has got self-determination development more than 50 years almost turn in a blank ex-

amination paper in the indigenization of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building, because they still stick to the unfashionable western old mode. In the face of the brand - new century, Chinese Christianity circles should recognize the serious situation, grasp the opportunity, carve out boldly and take an active part in constructing the modernization churches which are carved in our own nationality characteristics, using them to glorify the God, and also to show the glory of our God's creation in China.

I bring this article to birth in the hope of that it will stimulate the thinking of Christians in China as they contemplate their present places of worship and fully consider future building projects in the 21st century.

建筑已被公认为是一种凝固的音乐、物化的文明和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它凝聚着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区亿万劳动人民的创造性智慧，并赋予人化自然最直观的视觉艺术效果。教堂是基督教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神的居所”，是信徒与神进行交流的圣殿，也是上帝在世间创造的见证。因而，教堂建筑艺术不仅要体现出最基本的宗教性而且应体现出一定的时代性和地域特色。教堂自始有以来，就毫不例外地表征着这一真理。然而，中国教堂建筑从不敢越雷池一步，一直固守着西方中世纪盛行的教堂建筑模式。这一模式既不能反映出当代不断变化的神学思想，也不能体现出应有的中国特色，从而影响了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有时甚至还唤起了中国人对“洋教”的反感和仇视。本文拟从教堂建筑艺术风格变化的历史特点；亚洲教堂建筑处境化的探索；对中国教堂建筑的一点看法等几个方面探讨二十一世纪中国教堂建筑本色化、处境化的重要意义。

一、教堂建筑艺术风格变化的历史特点

每一时代的建筑艺术不仅要体现这一时期建筑材料的开发利用、建筑设计和建筑技术运用等水平,而且还应体现出不同民族的文化、心理、习惯和审美要求。有影响的建筑应是时代的化石和民族文明历史的见证。象埃及的金字塔、中国的长城等不仅成为世界建筑史上的艺术瑰宝,而且已成为一种文化。称这种建筑为艺术瑰宝是因为它“在任何时候都满足了一种深层的心灵需要”(德国,沃林格语),说它是一种文化是由于它“包含一个民族通过长期体力和脑力所取得的物质的、精神的全部成就”(北京大学,周一良语)。教堂建筑理应是一种建筑艺术。它不仅浓缩着时代信徒深刻的神学思考、丰富的想象力和杰出的创造力,而且也积淀着时代建筑水平和时代审美观念等丰厚的文化底蕴。它是神学家和建筑师通力合作的结晶。因此,有人说:每一时代有代表性的教堂建筑犹如一座座历史丰碑,铭刻着一件件让人难以忘怀的往事。

三世纪的宅第教堂,是在向后人诉说着基督教早期处在罗马帝国迫害之下,没有取得合法地位而只能在私人宅第进行礼拜的凄惨情景;四世纪君士坦丁时期,模仿古代希腊罗马雄伟的长方形会堂形式而建成的巴西利卡式教堂,彰显着基督教从非法到合法、从地下走向公开乃至国教的辉煌;六至九世纪,以砖砌穹顶的巴西利卡式和希腊十字式的拜占廷集中式教堂,折射出中西文化的交融以及拜占廷帝国荣耀政教的理想;以空间宏大、横厅宽阔而中殿纵深的拉丁十字式结构而建成的罗马式教堂,反映了当时欧洲经济复苏、朝圣运动以及十字军东征而带来的中世纪“第一次国际性艺术时代”的教堂建筑风格;十二世纪中叶起源于法国的哥特式教堂,体现了欧洲城市化运动的兴起、中世纪经院哲学的高度理性化

及新柏拉图神学思想光、高、数的三个理想。它摆脱了罗马式教堂给人的沉重感,以轻巧、雅致的尖顶和彩色玻璃墙体使整个教堂的外观呈向上腾飞的动势,制造出一种变幻莫测和灵魂超越的升华感。在当时的欧洲红极一时,并因此掀起了“第二次国际化风格”的教堂建筑新时代;十六至十八世纪末流行于西欧的巴洛克式教堂建筑风格,是在宗教改革思潮的影响下,教堂利用了光彩变化、透视幻觉以及增加层次来夸大视觉效果,制造出更为神秘的崇拜氛围,表达信仰的坚定和战胜邪恶的观念;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流行的新哥特式教堂是从中世纪哥特式教堂中汲取灵感,并使之与新古典式相抗衡的教堂建筑式样。它与十八世纪后期在欧洲掀起的浪漫主义文艺思潮,即以中世纪的小说和中世纪建筑为题材的风景画为背景,从而使人普遍产生怀旧情结有紧密关联,使得在宗教改革运动冲击下一度终止的哥特式教堂建筑艺术风格再次成为人们向往的式样,并在十九世纪所谓的“传教黄金时代”中伴随着殖民侵略而推行到世界各地。

从以上教堂风格变化的历史特点可以知道:教堂建筑不仅没有固定的模式,而且还渗透着深刻的神学思考和强烈的时代信息。二战结束后,随着世界殖民体系的瓦解,亚洲各国特别是东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纷纷建造出富有本民族特色的教堂,对教堂建筑处境化进行了大胆的尝试,从而使教堂建筑处境化从欧洲扩展到亚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二、亚洲教堂建筑处境化的探索

公元一世纪起源于西亚巴勒斯坦地区的基督教,最初只是犹太教的一个下层派别。随着地跨欧亚非的罗马世界性大帝国的建立,基督教逐渐同犹太教分裂并与西方的民俗、宗教以及希腊罗马

哲学熔于一炉,从而成为一个新的宗教在欧洲流行。四世纪初它成了罗马帝国的国教,并逐渐成为欧洲人的重要精神支柱。后来,随着地理大发现,特别是十九世纪殖民侵略活动,使得经过近千年本色化运动并已完全为欧洲文化所包裹的基督教流传到世界各地。

在殖民地的亚洲,传教士基本上采取武力传教的策略。当时的亚洲各国只得生硬地照搬西方的信仰、教义及教堂建筑模式,很少考虑各自的民族习惯和文化传统。结果形成了在注重理性和抽象思辨的西方文化传统上建造的教堂,与亚洲人所需要的宗教氛围极不协调的尴尬局面。1966年10月底在香港召开的东亚基督教大会,首倡把基督神学信仰与亚洲各国的具体实情相结合的战略思想。随之而起的是教会音乐、绘画和神学思想建设本色化运动的蓬勃展开。惟有教堂建筑的本色化运动相对滞后,这是由于战后一段时期,亚洲的教堂建设仍需西方资金的资助,临时搭建的教堂仍须遵循西方的模式。随着各国教会的独立,迫切需要对一些年久失修、不合时宜的旧式教堂进行改造和重建,教堂建筑处境化日趋紧迫。

所谓处境化首先要求本土化或本色化,即外来文化为本土文化所接受,然后再与本土的具体处境相适宜。换句话说,处境化就是外来文化要主动与本土传统文化和现实具体环境相协调,并得到本土文化广泛的认可,从而在本土文化中享有一席之地。教堂建筑处境化既要求保留原有教堂建筑风格的精华又要求体现出明显的时代和民族特色。前文所述的西方教堂建筑风格变化的历史特点就是西方教堂不断处境化的历史表现。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亚洲的日本开始出现了把基督教的神学思想和历史与本民族自然环境和人文精神相结合的教堂建筑指导性书籍。接着亚洲各国纷纷抛弃不合时宜的西方教堂建筑模式,揭开了教堂建筑处境

化的新时代。

日本是一个空间有限的国家,其“建筑”的字面意思历来就有“借风景”之义。即“创造性地利用自然景观,使所建之物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①。古都奈良的主教堂就是建筑师巧妙地利用米卡萨山的杰作。米卡萨山仿佛成为该教堂的后院,使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非常和谐地结合成一体。在最冷的北海道地区,建筑师们把教堂建在深山密林丛中的人工湖上。教堂以硕大的玻璃墙体与自然融为一体,真正成为: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种巧夺天工的创造,使得人禁不住感叹上帝创造的伟大魅力^②。当代著名的日本神学和社会伦理学教授竹中正夫先生说得好:“如果自然环境是上帝创造的一部分的话,在教堂建筑上考虑与自然的和谐是很重要的”^③。

基督教堂的建筑不仅要考慮自然因素,而且还应表达出基督团契“爱与和谐”的基本精神。而最能反映这种精神的形状应当是圆形而不是长方形。因此,教堂建筑上应抛弃中世纪拉丁十字型平面设计,因为它人为地划分出人格不平等的空间秩序,而应采用洋溢着现代集中式的向心力和亲和力的圆形平面设计。它象征性地表达了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以及神人沟通、共同参与的理念。何琦博士对此曾精辟地比喻道:“当你与朋友分享宴席的时候,究竟是坐在分列主次的长方形餐桌还是坐在不分主次的圆形桌旁更亲切、更有参与感呢?”^④ 竹中正夫先生也强调:“教堂在日常生活中应发扬基督所倡导的相互分享和共同参与的精神”^⑤。富有创意的韩国当代艺术家李成基就曾用四种不同的颜色来与四季和四

① Masao Takenaka(竹中正夫)THE PLACE WHERE GOD DWELLS(神的居所)Christian Conference of Asia and Asian Christian Art Association,1995,第15页。

② 奈良和北海道教堂的图片可参阅竹中正夫先生《神的居所》第66页、第72页。

③ 同注①第15页。

④ 同注①第17页。

⑤ 何琦《建设有特色的中国教堂》99/4《天风》。

种象征性动物相对应,去表达这种和谐的圆。东京神学院的教堂不仅在外型上表现出东方传统的圆形风格,而且在教堂内用圆形灯光配合圆形的屋顶,去形成一种奇妙的图案环绕在讲坛墙上白色的十字架上,以表达一种和谐及信仰、希望和热爱的效果^①。

深受汉民族文化影响的东南亚地区,由于汉民族文化已是该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它们的教堂建筑艺术风格明显保留着儒家文化的痕迹。韩国江华的安立甘教会教堂建在靠近仁川的山上,其建筑风格完全是按照韩国孔庙的那种飞檐挑角、雕梁画栋、琉璃瓦、大屋脊等传统建筑模式。在泰国的那坤巴统(佛统),由中国建筑师设计建造的巴门让格塔姆大教堂,外观呈汉字等臂的“人”字型。“人”下佩带着象征基督的十字架,表达了“以人为本,神人合一”的基督精神。而新加坡的三一神学院教堂,其外观也成汉字的“人”字型,但它却表现出了另一种风格。其“人”字的两边不等长,长长的十字架在“人”字的头顶上高高托起,表达了人要继续信奉上帝、追寻上帝的神学含义^②。这几个都是深受汉文化影响的国家,有的甚至借用同一个汉字的寓意,但它们都保持了各自的风格,以其民族特有的理解方式和认可方式去建造属于它们自己的神圣殿堂。

另外,在亚洲富有地方特色和时代精神的处境化教堂还有很多。例如,反映印度民族隐修传统而采用达罗毗荼人尖庙塔装饰的克里斯土库拉塔式修道院;反映台湾兰花岛亚米家族捕鱼为生的兰盖渔船形教堂;反映基督和佛陀之间关系的香港道风山八边形亭式圣殿;还有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梭罗克顿的圣保罗大教堂的设计,真可谓独具匠心,其外观呈一顶现代化的大帐篷,内饰有鱼、

① 东京教堂的图片可参阅《神的居所》第 74 页。

② 韩国、泰国、新加坡三国教堂的图片可参阅《神的居所》第 78 页、第 82 页、第 96 页。

杯子和面包等象征物。它的用意是为了告诫崇拜者还在朝圣的漫漫旅途中^①。

以上简列的几例足以说明：西方的基督教已成功地在亚洲生根、开花并结出了硕果。它完全成为这些国家和地区自己的宗教。然而，与这些国家和地区有相同经历的中国大陆，在营造神的居所上，在教堂建筑本色化和处境化等方面确实让每一个有自尊心的中国人感到汗颜。

三、对中国教堂建筑的一点看法

中国教堂建筑史发端于公元七世纪唐贞观年间的大秦景寺。但西方传教士正式有规模地在中国筑堂传教还得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所签订的“南京条约”算起，至1949年也有一百多年了。在这一个多世纪里，中国教徒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生活（也包括其它社会生活）乃至教会的领导权都一直控制在外国人手中，因而教堂建筑也不可避免地要照搬西方的模式。全国教堂除少数为罗马式建筑风格外，其它基本上都采用了西方当时流行的哥特复兴式。这种教堂的主要特征是：教堂的两侧分列着高耸入云的火箭式小尖塔（这种小尖塔原系十字军东征时受伊斯兰教清真寺宣礼塔的启示而设计的）；教堂的门窗都镶嵌有彩色玻璃；教堂的正面都刻有反映《圣经》故事的石雕和雕像。这些特征都是在西方人特有的思维模式和文化背景基础上，去表现一些只有他们自己才能理解的抽象理念。因此，这种教堂在神学思想表达上、宗教氛围渲染上以及审美观念上都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去甚远。这是因为，在神学信仰问题上，西方人较偏重于抽象的理念以及哲学上的思考。

^① 印度、台湾、香港和印度尼西亚的教堂图片可参阅《神的居所》第38页、第52页、第58页、第99页。

而中国人较注重实际和具体、重视直觉和现世，不尚玄想。因此，“用抽象的、偏向哲学思考的神学与较重实际现世的中国人交流，中国人是不太理解的”^①。然而，在那强行传教的特殊年代里，广大的中国信徒除了被动地接受异族宗教文化甚至生活习惯的灌输、默默地祈祷中国基督教的春天早日到来之外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基督教挣脱了西方差会的控制，掀起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三自爱国运动。此时的亚非拉各国在赢得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同时，却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基督教本色化运动：努力把神学思想建设、教会建设及教堂建筑与本国具体实情相结合；用本民族容易理解和喜闻乐见的符号系统去建构披着西方文化外衣的基督教思想；使来自西方的基督教从内容到形式上都呈现出明显的时代性和民族性。象拉美的解放神学运动、亚洲教堂建筑处境化的探索等都引起了举世关注。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当时的中国国门紧闭，再加上后来受到极左路线的冲击，中国基督教没能赶上这一大好的发展形势而一直裹足不前。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时仍滞留在解放初的水平上，远远落后于世界基督教的发展态势。

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下，中国基督教迎来了发展史上的又一个春天。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得到了真正的落实和保护。宗教的发展基本上不再受客观外在的干扰，中国宗教的发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主动权。然而二十年来，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运动仍然不见有什么较大的起色。信徒人数虽有较大增加（已有一千万），但是不少人还处在盲目信仰和游离状态，犹以农村信徒居多。这些人还不能算是真正的信徒，或者至少不能算是坚定的信仰者。

^① 林治平《基督教在中国本色化》（论文集）今日中国出版社，98，北京，第17页。

教会和神学思想建设的本色化运动也才刚刚启动,仍处于摸索之中。其中,我认为中国教会最为愧疚的事应该是:五十年来,耗费巨资和人力去翻修和重建的大量中国教堂仍然墨守着西方中世纪教堂建筑模式,在教堂建筑本色化上几乎交的是白卷。究其主要原因乃是一些保守的老牧师和圣会恋恋不舍那些与中国文化很难沟通、严重落后于这个时代的西方中世纪教堂建筑模式。他们不顾当代宗教发展所面临的世俗化、多元化、全球化甚至市场化等日趋严峻的形势,打着护教的旗号,拒绝任何形式的中国化改造,并强行钦定只有他们那样的基督教才算是正宗的、合法的和有效的。

在这里,我们姑且不论这些保守者们漠视历史上基督教不断地本色化、处境化等方面的事实,单就其“善良”的护教动机来分析。首先,他们忘记了他们的神圣职责不仅是护教而且更应该是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去宣教,以便让更多的中国人真切地聆听到上帝在中国的福音、感受到上帝在中国创造的荣耀。其次,他们的护教主义其实是在害教,因为随着宗教世俗化的发展,宗教信仰已呈多元状态。在中国合法的宗教不象欧洲当时只有一家垄断,而是五家并存的局面。在它们当中除土生土长的道教不提,其它各家均为外来宗教,只有佛教做的最好。佛教自慧能大师的宗教革命(即佛教中国化)之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佛教不仅成功地融会到中国文化、溶入到中国民众的习惯和心理之中,而且还反哺了中国文化,在中国稳稳地占据了一席之地。伊斯兰教在中国也有其深厚的民族基础。惟有披戴“洋教”的基督教始终给人一种水中浮萍、空中楼阁的无根基感觉。在多元和市场的效应下,宗教的生存必然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在中国,各家宗教都在使出浑身的解数去满足消费者(信徒)的需要,去争取更多的信众到自己的周围来。如果基督教还是这样夜郎自大,以过时的外来文化和不到1%的区区信众去超越根深叶茂的中国传统文化,并还企望把福音撒遍

中华大地,其结果势必会将中国基督教带入死胡同。再次,这些“护教使者”应该知道,中国的广大基督教信众主要生活在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村,这些信众对他们所推崇的“原汁原味”的基督教是很难从理解上去信仰的。他们应该明白“通俗易懂的教堂艺术风格和神学思想对儿童及广大农村信徒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个极其简单的事。早在十五世纪一位托马斯主义哲学家多米尼西就对那些不问对象的传教者提出过警告:“如果盲目照搬别人的图像不与本民族习惯相结合,连有学问的人都要很费脑筋去理解,对文盲又有何益?”他们真应该清醒清醒呀!最后,这些人竟还忘了基督教曾在中国扮演过不光彩的角色,以及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历来都很强的历史事实。他们不知道:曾有多少爱国的中国人对他们所自鸣得意、奉若神明的洋教堂感到耻辱和憎恶;曾有多少善良信徒感到自己纯真的感情受到欺骗和伤害;曾有多少企盼福音的中国人在“洋教堂”的大门口徘徊。他们应该向上帝忏悔,对中国基督教五十年来久衰不盛负责。教界富有正义感的一些神职人员早就对他们名为护教实为害教的行径心急如焚、焦灼无比,曾气愤地把他们所推崇的所谓“新哥特式”教堂称为“伪哥特式”、“假冒哥特式”、“洋教堂”,并把这些“使者”也斥之为“假冒伪劣洋货的二道贩子”和“拒绝长大且有恋母情结的精神病人”。

回首新中国基督教五十年来所走过的艰难路程,虽有许多无奈和遗憾,但我们应该看到:为使中国基督教这棵幼苗能茁壮成长,也有许多开明的老牧师和教会的领袖在默默地耕耘和忘我地工作;同时我们更应该看到一大批对中国基督教充满爱心、充满信心并且有很强责任心和事业心的中青年神学工作者正在成为新世纪中国基督教大业的中流砥柱。青年历来被寄予厚望,中国基督教的振兴当然也离不开这些青年人。他们头脑灵活、勇于实践、敢于创新、能紧紧把握时代跳动的脉搏并积极承担历史赋予的重任。

有了他们，我们没有理由不为中国基督教的美好明天充满憧憬和欣慰。但是在中国这个特殊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青年神学工作者，不要一味地苛求历史、抱怨历史，而要正视当下的现实，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去创造中国基督教灿烂辉煌的历史。

具体落实到教堂建设上，我认为：首先，应该明确教堂建设在中国基督教发展中的重要性。把教学建设上升到爱国爱教、荣神益人的高度去认识和理解。并能敏锐地意识到教堂建筑的本色化、处境化已是一个全球的发展趋势。在中国它不仅是事关基督教生死存亡、兴衰成败的大事，而且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坎特伯雷大主教伦西博士曾在八二年就提出过这样的忠告：“只有维护自己的性格，热爱自己的根，你才能为普世教会作出贡献”^①。中国基督教工作者应铭记在心。另外还要意识到，在没有很深根基的环境里，教堂就是基督的形象工程和守门人，应十分慎重地塑造好基督在中国的容貌。其次，就是要大胆借鉴其它国家和地区教堂建设上的成功经验，并多多向中国的建筑大师们请教。使中国教堂文化除了发扬基督精神本质、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外，还能反映出当代中国人深刻的神学思考，即“能够回应我们现代中国所处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巨大变革。这也许是我们神学思想要处境化的一个全部的意义”^②。最后，教堂建设是事关教会全局的大事。它需要教内外人士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同时更需要教内人士同心同德、通力合作才能完成。尤其需要强调的是，我们的一些老同工应放手、放心地让青年人去面对新世纪的挑战。我想：只要人人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献出一份真情、献出一份关爱。中国基督教一定会“奉献出富有时代精神感、处境化的神学思考和有创

^① 《丁光训文集》译林出版社，第41页。

^② 沈以藩《中国教会在神学思考中》香港《中国与教会》，双月刊第66期，88年7—8月号第18页。

造力、想象力的教堂，以此来赞美我们的神，彰显神的创造的荣耀”^①。

在此，我们真切地祈祷和祝福：在新的世纪里，中国教会能充分注意教堂建筑处境化，并能以最快的速度向关爱她的神和人奉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① 何琦《建设有特色的中国教堂》99/4《天风》。